

# 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春秋胡氏传》的关系

钱寅

**摘要:**研究清代公羊学复兴者,往往认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是清代公羊学的重要著作。然而通过对《春秋正辞》解经内容的细读,以及对其经义征引来源的考察,可以看出庄存与书中很多地方与《春秋胡氏传》有着极强的关系。而且《春秋胡氏传》的义理对庄存与的《春秋》学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庄存与本身是科举考试的成功者,《春秋胡氏传》亦是长期以来官方指定科举书目。或许正是由于经历了科举考试,才使得《春秋胡氏传》对庄存与的《春秋》观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春秋正辞》;《春秋胡氏传》;庄存与;公羊学

**作者简介:**钱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6.05.013

## 一、问题的提出

在清代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中,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多被今人誉为有清一代公羊学之首。这一观点似乎起始于嘉庆六年朱珪为《春秋正辞》所作的序,序云:“余受而读之,义例一宗公羊,起应寔述何氏,事亦兼资《左氏》,亦或拾补《穀梁》。”<sup>[1]</sup>揣摩朱序之意,大概可以看出朱珪认为《春秋正辞》一书以公羊学(尤其是何休经说)为主,兼采其他学说。阮元撰《庄方耕宗伯经说序》中也评价道:“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转违戾也。”<sup>[2]</sup>诚如二家之言,那么庄存与的确可以称得上清代复兴公羊学之领袖。但是,同出阮元之笔,其作《拟国史儒林传序》中于公羊学独推孔广森,“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sup>[3]</sup>考孔广森不仅年齿远逊庄存与,其著《春秋公羊经传通义》更是内容驳杂,不主何休家法。阮元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于公羊学术只表彰孔广森而不言庄存与,似乎与其在《庄方耕宗伯经说序》中的态度有所不同。实际上,从《春秋正辞》内容本身来看,其间杂用公羊、穀梁以及各自学者之说,甚至兼取程颐等宋人之说。若以今文经学家法为规矩来考量,《春秋正辞》一书实在不可称为标准严格的公羊学著作。

那么普遍称庄存与《春秋正辞》是公羊学,是否属于“人云亦云”呢?也不尽然。《春秋正辞》内容驳杂的事实已经被前辈学者注意到,只是在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似乎有意为庄存与回护,认为即使庄存与没有用公羊家说,也是对《公羊经》义的补充和拓展。明显的例子如郅积意在《论庄存与的公羊学》一文中指出了《春秋正辞》在很多地方并没有用公羊说,而是用了《左》《穀》二传,“并不纯粹是汉代公羊学的立场”<sup>[4]</sup><sup>59</sup>,但在全文的结论上仍然认为“其实质乃注重公羊学的义理。庄氏的特点在于,他不是照搬汉代公羊学的解释系统,而是以政治等级制为中心扬弃汉代公羊学,此种政治学说是否与他

的政治生涯有直接的关联,在《春秋正辞》等著述中并没有直接的显示”<sup>[4]64</sup>。从这个结论上可以看出,虽然邵先生有对艾尔曼等学者关于清代公羊学术发展史认识的再审视<sup>①</sup>,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春秋正辞》公羊学特质的肯定。再如研究公羊学史独成一家的黄开国,坚持认为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sup>②</sup>。同时,他也发现《春秋正辞》中的某些观点不同于《公羊传》及董、何经说,但却将这些观点视为庄存与自己的发挥,并且认为从书法上看《春秋正辞》仍属公羊学。黄先生在文章中曾举例:“尽管在对《春秋》之义的阐释上,他不完全同于《公羊传》或是董仲舒、何休之说,如宣公十有一年,‘楚人杀陈夏征舒’一条,董仲舒认为是反对诸侯专杀之义,而庄存与却以为是肯定楚王讨贼之义。但是,庄存与关于《春秋》书法阐释,与《公羊》学几乎完全是相同的,则是不可否认的。”<sup>[5]</sup>从这段论述来看,黄先生发现了《春秋正辞》中关于“传义”引用的问题,但并没有解释清楚出现问题的原因,而是曲为回护。

由黄文所举之例为线索探求,能够发现庄存与之所以弃用董仲舒等公羊学家的观点,实际上是因为暗袭了宋代胡安国《春秋胡氏传》的说法。检《春秋胡氏传》对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这一条经文的解读,能够发现胡安国认为:

称人者,众词也。大恶,人人之所同恶,人人之所得讨。其称“楚人杀征舒”,诸夏之罪自见矣。……经先书“杀”后书“入”者,与楚子之能讨贼,故先之也。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仲尼重伤中国,深美其有讨贼之功,故特从未减,不称“取陈”而书“入”,虽曰与之,可矣。<sup>[6]275-276</sup>

由此可见,庄存与在撰写《春秋正辞》时,可能受到了《春秋胡氏传》不小的影响。进而问题由此提出,《春秋正辞》与《春秋胡氏传》之间到底有着一种怎样的联系?为求释疑,只能细读《春秋正辞》的内容。通过对《春秋正辞》的细读,笔者发现该书根据《春秋胡氏传》进行发挥的地方有很多。庄存与在采辑诸家经说时,《春秋胡氏传》的义理往往起到“先入为主”的作用。这样就很好地解释了对经文的阐释上,庄存与为何会或选取《公羊传》,或选取《穀梁传》,或选取董仲舒说,或选取何休说,或选取刘向说,或选取刘歆说,或选取程颐说等。于是,笔者尝试对《春秋正辞》与《春秋胡氏传》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考辨。

## 二、《春秋正辞》引《春秋胡氏传》考

### (一)《春秋正辞》与《春秋胡氏传》渊源考

庄存与在《春秋正辞·叙目》的开篇,即称:“存与读赵先生沅《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櫟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sup>[1]5</sup>后世读者多由此而发挥,认为庄存与的学术受到了赵沅《春秋属辞》的影响。按,赵沅是元明之际的学者,所谓《春秋属辞》盖取典自《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sup>[7]</sup>赵沅的《春秋属辞》重义不重事,并且采用分条目归纳的体例,这些对《春秋正辞》的写作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翻阅《春秋属辞》原书之后,可以看出该书基本上是对《春秋》经文书法的解读,而非着重于经文的大义。这一点可以从《春秋属辞》的目录明显看出:

存策书之大体第一:一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告朔朝正书王正月,二即位不在正月故不书正月,三岁首必书,王月无系月之事不书王月;四一时

① 美国学者艾尔曼在其著作《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主要论点,即庄氏家族的今文经学与和珅擅权的政治局面有关。

② 这一观点可以从黄开国专著《公羊学发展史》及论文《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等著作看出。《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载于《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第29-32页。

无事书首月；五事之系日者遇晦朔则书晦朔；六丧以月断者遇闰则书闰……

假笔削以行权第二：一公如大国恒书至，则不书至以见义；二公会诸侯恒不书至，则书至以见义；三公会伯主恒不书至，则书至以见义；四公会盟主恒书至，则不书至以见义；五公会外大夫不书至，会师则书至……

变文以示义第三：一文同礼失王不称天；二讳公与王卿士盟不书公同微者；三讳公与外大夫盟不书公同微者，以大夫盟公去其族……

……<sup>[8]</sup>

由所举的几条目录来看，显而易见的是赵沅的著作重视对《春秋》书法的分类举例。但是读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则能发现其更重视义理层面的发挥，明显带有赵沅学术痕迹的应该是分类归纳并加以阐述的写作方法，以及在阐述经文大义之间对相关“书法”研究成果的利用。

考《春秋正辞·叙目》中所列条目：

正奉天辞第一

正天子辞第二

正内辞第三

正二伯辞第四

正诸夏辞第五

正外辞第六

正禁暴辞第七

正诛乱辞第八

正传疑辞第九<sup>[1]6</sup>

可以看出，这些条目都是经义大端，而非“书”与“不书”这样的细节。但仅仅依据目录的比较尚不足以认定庄存与《春秋正辞》与赵沅《春秋属辞》之间关系并不紧密。事实上，从《春秋正辞》全书内容来看，庄存与的确吸收了赵沅关于《春秋》“书法”的研习成果，只是从著作通篇的立意上庄存与明显是“识其大者”。

那么胡安国的春秋学术又是怎样影响庄存与的呢？从胡安国对《春秋》的理解来看，他认为《春秋》是“史外传心之要典”<sup>[6]1</sup>①，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sup>[6]</sup>，即视《春秋》为“天理”。在《春秋胡氏传·春秋传序》的末尾，简括了《春秋》“大法”，即“尊君父、讨乱贼、闢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sup>[6]2</sup>。这几点虽然简单，但是从《春秋正辞》的叙目里可以依稀看到其踪影②。

《春秋胡氏传》能影响庄存与之学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科举。《春秋胡氏传》本为奉宋高宗旨意而作，书成之后被长期用为应对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明代修《五经大全》，其中《春秋大全》亦以《胡氏传》为主，而兼采三传。《春秋胡氏传》是以应试为目的而研习《春秋》的必读书目，而《五经大全》在明清科举史上都是重要的必考资料。这样《春秋胡氏传》的影响日趋广大，直到清高宗乾隆末年科举考试废弃《胡氏传》③，胡安国的学说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身处科举考试时代的庄氏家族是科举望族，庄存与考取了乾隆十年（1745）的榜眼，证明其是非常擅长应付科举考试的。在庄氏家族中，庄存与之

① 这个观点在《宋史·儒林传》《胡寅先公行状》《伊洛渊源录·胡文定公》等相关传记资料中也屡有体现，可见此乃胡安国学术中的一个核心思想。

② 如“正奉天辞”与“《春秋》即‘天理’”相应，“正天子辞”与“尊君父”相应，“正诛乱辞”与“讨乱贼”相应等等。

③ 据《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九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壬午条记，纪昀等人奏请科举考试废除《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穀梁》，高宗准奏。

弟庄培因以及庄培因的岳父彭启丰等都曾考取过状元的功名,而同庄氏联姻的刘氏、彭氏家族也都在科举考试中人才辈出。在一个普遍擅长科举考试的氛围中,被当做科举教材的《春秋胡氏传》自然能影响到庄存与对《春秋》经义的认识,至少能够认定庄存与应该对《春秋胡氏传》的大意是熟知的。于是,庄存与《春秋正辞》吸收《春秋胡氏传》的思想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 (二)《春秋正辞》对《春秋胡氏传》的吸收

首先,《春秋胡氏传》影响了《春秋正辞》对诸家经说的去取。读《春秋正辞》能够发现,庄存与采辑了《公羊传》《穀梁传》《程氏传》以及董仲舒、何休、刘向、刘歆的学说。但是在对具体经文的解读上依据哪家学说,庄存与是有自己的“主观意见”的。这种“主观意见”很多来自于《春秋胡氏传》。前文已举一例,再举若干例来看:

《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审天命废兴》:元年,春,王正月。桓公穀梁子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所以治桓也。”<sup>[1]13</sup>

按,此条经文《公羊传》及何休亦有阐述。《公羊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注:“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恶。直而不显,讳而不盈。桓本贵当立,所以为篡者,隐权立,桓北面君事隐也。”<sup>[9]2212下栏</sup>显而易见,《公羊传》以为书“王”是为了著桓公之恶。但庄存与却吸收了《穀梁传》的“谨始”说,这种去取的态度正应了胡安国的思想。《春秋胡氏传》:“《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贬绝,备书终始讨贼之义,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不可以邪汨之也。”<sup>[6]43</sup>

又如:

《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审天命废兴》:二年,春,王正月。桓公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sup>[1]14</sup>

按,据《春秋》经文,桓公二年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公羊传》传经,重于阐述宋督弑君与夷的褒贬,未关注是否应该书“王”的微言大义。《穀梁传》:“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sup>[10]2372下栏</sup>“正与夷之卒”与“正督之罪”所传经义相近,但命意角度不同。庄存与在这条经文的解读上,既没有选择《公羊传》,也没有吸纳《穀梁传》,而是采用了宋学对《春秋》的解读,这也是接受了《春秋胡氏传》的影响。《春秋胡氏传》:“桓无王而元年书‘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无王而二年书‘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未尝亡也。’其说是矣。穀梁子以二年书王,正与夷之卒,其义一尔。以为诸侯之卒,天子所隐痛,故书‘王’以正之,误矣。”<sup>[6]45①</sup>从《胡传》可以看出胡安国对《穀梁传》和程颐的看法进行了一番比较,最终认为程颐之说更准确,进而采纳了程颐之说。于是,庄存与也因袭胡安国,选择了程颐之说。

再如:

《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宗文王》:春,王。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闻之曰:受命之王曰大祖,嗣王曰继体。继体也者,继大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继文王之体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武王且不敢专,子孙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圣人之志也。《君牙》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天子之事守也。<sup>[1]9</sup>

① 《程传》原文:“桓公无王,而书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灭矣。督虽无王,而天理未尝亡也。……”见《二程集》下册《河南程氏经说》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101页。



按，关于隐公元年春书“王”的理解，庄存与引用了《公羊传》的说法，并且围绕《公羊传》开展补充论述。关于这一条《公羊传》文，何休亦有论说：“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sup>[9]2196中栏</sup>这里何休只讲到文王受命于天，但是并没有对“宗文王”进行理性地思辨。庄存与在自己的诠释中加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天道”，他认为“宗文王”乃“天道”，“所以尊祖，所以尊天”。这个观点即从《春秋胡氏传》中来。《春秋胡氏传》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说到：“古者诸侯继世袭封，则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则上必有所禀。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与争乱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绌隐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伦正矣。”<sup>[6]3</sup>读《春秋胡氏传》即可感觉到胡安国认为继承先君是正“父子君臣之伦”的重点，这就是何休所谓的“王法”，也是胡安国自己所认为的“天理”。因此，要受命于先君，才能保证王道的安宁。胡安国在解读这一经文时，吸收了《公羊传》以及程颐的观点。《程传》云：“书‘春王正月’，示人君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正。……诸侯之立，必由王命，隐不书即位，明大法于始。隐公自立，故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也。……”<sup>[11]1086</sup>在此基础上，胡安国再加以自己的发挥而成一家之言。庄存与则在胡安国的启发下利用《公羊传》义，深刻阐发了“尊天”“尊祖”的概念，进而发表了“宗文王”的思想。

其次，庄存与在写作《春秋正辞》时，很多地方不明引诸家经说，而是暗袭《春秋胡氏传》的观点。所谓明引诸家经说，即《春秋正辞》中会直接提到“公羊子曰”“穀梁子曰”“何休曰”“董仲舒曰”云云。但在对于一些经文的解释中，庄存与并没有明确引用诸家学说，而是直接展开自己的论述。这些论述中往往暗中因袭了《春秋胡氏传》的看法。举例来看：

《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察五行祥异》：大饥。襄公二十有四年，冬。有死伤曰饥，死伤甚曰大饥。

此皆凶年也，何为或书其本，或书其末？书其本，无备也。土怠也；书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民力殫矣，王泽竭矣。<sup>[1]26</sup>

按，关于“大饥”，何休以为：“有死伤曰大饥，无死伤曰饥。”<sup>[9]2309下栏</sup>很明显，庄存与不同意何休的解读。在《奉天辞·察五行祥异》中，庄存与几乎很少引用宋代《春秋》学的成果，而是更多地吸取汉代经说。这大概是由于宋人言理学，对五行灾异之说都有更理性的解读方式，不适合于这样的主题吧。但是在对这一条经文的解读上，庄存与则吸收了胡安国的看法。《春秋胡氏传》：“古者救灾之政，若国凶荒，或发廩以赈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为粥溢以救饿莩，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缓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盗贼，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杀礼物而不备，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所以备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阴沴之灾，而冬大饥，盖所以赈业之者有不备矣，故书之以戒。”<sup>[6]369-370</sup>庄存与的观点与《胡传》相仿，都认为书“大饥”是为了警戒国君平时要爱恤百姓，常备灾患。不同之处在于《胡传》描述了胡安国心目中的古代救灾体制，而庄存与仅从书法着手讨论。

又如：

《春秋正辞》卷十《诛乱辞·弑》：春，齐人杀无知。庄公九年。孰杀之？雍廩杀之。雍廩以报其虐，其以讨贼之辞予之何？不逆诈，废正法也。不地，在内也。不月，略之也。略之，何也？以为未足乎讨也。未足乎讨，而亟予之，人得讨之之义也。<sup>[1]187</sup>

按，经文“齐人杀无知”，《公羊传》无传，《穀梁传》云：“无知之挈，失嫌也。人以杀大夫，杀有罪也。”疏云：“重发之者，月与不月，地与不地之异，故重发之。”<sup>[10]2382中栏</sup>《穀梁传》在经文义理发挥上略显简单，庄存与在书法上借鉴了范宁的解释。考《春秋胡氏传》：“杀无知者，雍廩也，而曰‘齐人’者，讨贼之词也。弑君之贼，人人之所恶，夫人之所得讨，故称‘人’。人者，众词也。无知不称君，已不能君，齐人亦莫之君也。”<sup>[6]100</sup>对比庄存与的论述来看，雍廩杀无知、称“齐人”为讨贼之辞等观点上直

接采纳了胡安国的看法。而“无知不称君，己不能君，齐人亦莫之君”，正是庄存与所言“未足乎讨”的理由。不难看出庄存与在阐释经文时对《胡传》义理的吸收。

当然，《春秋正辞》的定位并不是一部为《春秋胡氏传》作注脚的著述。因此，庄存与在论说经文时也会斟酌《春秋胡氏传》的义理，提出不同的解读角度。比如：

《春秋正辞》卷二《天子辞·王臣会诸侯》：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公十有三年。此与秦战，何为不言战？义不系乎战也。诸侯不王，因伐秦而后王。晋有秦怨，连东诸侯之师，逾数千里，越河山而伐秦，伐则已著矣，义不系乎战也，且不使秦得以敌乎诸侯也。王官不书，以为非天下之事也。<sup>[1]57</sup>

按，关于成公十三年五月这段经文的解读，庄存与并没有引征诸家经说，而是进行了自我发挥。考《春秋胡氏传》：“诸侯每岁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觐之礼者。今公欲会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礼。书曰‘如京师’，见诸侯之慢也，因会伐而行矣。又书‘公自京师’以‘伐秦’为遂事者，此仲尼亲笔，明朝王为重，存人臣之礼也。……观《春秋》所载，天王遣使者屡矣，十二公之述职，盖阙如也。独此年书‘公如京师’，又不能成朝礼，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伦也，而至于此极。……”<sup>[6]324</sup>胡安国在是吸取《公羊传》的相关观点后，围绕自己“《春秋》即天理”的核心思想，展开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相比之下，庄存与认为这段经文“义不系乎战”，即想表明的意义并不在“战”上，而且诸侯之间的恩怨战争只是个体间的行为，不是天下之事。

另外，在对具体事件的褒贬上，《春秋正辞》也有与《春秋胡氏传》不同的地方。

《春秋正辞》卷二《天子辞·王伐》：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桓公五年。蔡、卫、陈皆何以称人？侯不行，使大夫从也，其与几何？《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国不可见，以从王伐国者见之。何为见之？非所以伐也，郑伯当诛矣。王躬不可以不省，不可以不重。轻用其民，王室危；轻用其身，天下危。从命拒命，不竟录也。郑罪既盈于诛，《春秋》之义，务全至尊而立人纪焉。月不系王，伤三王之道坏也。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系王于天，一人匪自号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从王焉，朝于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于天，若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系于王则止，皆不得以不称天为疑问矣。<sup>[1]51</sup>

按，关于“从王伐郑”的经文，《公羊传》义主要在于赞扬“诸侯从王”这种行为；《穀梁传》在赞扬“诸侯从王”这种行为的同时，认为伐郑这件事应该为王避讳；《左氏传》则叙述了“周郑交恶”的史实。庄存与并没有引用诸家之说，而是直接抒发了自己的议论。那庄存与是否采用了《春秋胡氏传》呢？也没有。考《春秋胡氏传》：“按《左氏》：‘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春秋》书王必称‘天’者，所章则天命也，所用则天讨也。王夺郑政而怒其不朝，以诸侯伐焉，非天讨也，故不称‘天’。或曰：郑伯不朝恶，得为无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恶，人理所不容也，则遣使来聘而莫之讨。郑伯不朝，贬其爵可也，何为愤怒自将以攻之也？移此师以加宋、鲁，谁曰非天讨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时措之也，既讥天王以端本矣。三国以兵会伐，则言从王者，又以明君臣之义也。君行而臣从，正也。战于繻葛而不书‘战’，王卒大败而不书‘败’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sup>[6]57</sup>胡安国吸取了公、穀两家之说，在肯定诸侯听命周桓王的同时，批评伐郑之战的不义。反观庄存与则是站在了周王室的立场上，认为这段经文的大义应该是肯定伐郑之战，讥贬了郑国的“不知有天子”。当然，周王应系之于“天”这种看法还是具有《胡传》的味道。

### 三、对问题的回应

通过前面以文本比较为方法的讨论，不难看出，宋代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对庄存与《春秋正辞》

有着深远的影响，庄存与的《春秋》学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胡安国的思想。从《春秋正辞》的纲目上，显而易见的是“大一统”“通三统”“建五始”“异内外”等这些公羊学派的基本思想，但是从对经文的阐释上又有很多地方依据《春秋胡氏传》而对《公羊传》和其他经说进行取舍。因此可以说，《春秋正辞》与《春秋胡氏传》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

那么，《春秋胡氏传》同公羊学之间是否义理相悖呢？当然不是。胡安国之学同公羊学一样，都是“重义不重事”的。而且胡安国在建构自己的《春秋》学说时，吸收了《公羊传》《穀梁传》和《左氏传》的观点。《春秋胡氏传·叙传授》：“故今所传，事按《左氏》，义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纲本孟子，而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云。”<sup>[6]14</sup>可见胡安国之学本有根源，《公羊传》即是其中之一，胡安国在阐释《春秋》经文的时候，很多地方也直接利用了公羊学说。因此，《春秋正辞》中的一些内容看起来似乎是公羊学的，实际上也很有可能是在《春秋胡氏传》基础上进行利用。

不过，通过前文的论述，还是可以看出庄存与并非一味盲从《春秋胡氏传》。就前引对三国“从王伐郑”经文的解读来看，之所以庄存与和胡安国会有相反的褒贬态度，是和两人所处时代的政治局势有关。胡安国写《春秋胡氏传》在宋室南渡之后，国家成偏安之局，故而要强调天子的合法性，这才会对“王”的行为是否得当予以关注。而庄存与生活在清朝乾隆时代，为大一统的王朝服务，其意识里自然不能允许“诸侯不知有天子”。这种社会政治背景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二者对经文解读的差异。

以往提到庄存与的学术时，学者常会引用一幅对联：“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若己问，作耳闻，圣贤在座。”用以说明庄存与的学术志趣在于张大西汉经学<sup>①</sup>。如果仔细分析这幅对联的用典及其含义便不难发现，这幅对联并不适于用来证明庄存与的学术取向。按，“若己问，作耳闻”出自《四书章句集注·读论语孟子法》。《读论语孟子法》引程子之说：“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sup>[12]44</sup>此句被庄存与化用为“若己问，作耳闻”。“玩经文，存大体”，虽然典出《汉书·艺文志》<sup>[13]1723</sup><sup>②</sup>，但是如果联系“理义悦心”一句来看，则更可能是间接引用了《读论语孟子法》。程子曰：“《论》《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sup>[12]</sup>这不正是“玩经文，存大体，理义悦心”的绝妙注脚吗？由此可见，这幅对联所标榜的学术取向，乃用来应对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

另外，今文学家刘逢禄曾称外公庄存与“素精董氏《春秋》”，这样看来似乎庄存与有很深的公羊学造诣。依据刘逢禄的记载，庄存与对董氏《春秋》的熟悉体现在乾隆九年（1744）“大考翰詹”时。因为这次考试的题目即为“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庄存与由于能够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为清高宗所嘉叹<sup>[14]</sup>。据此来看庄存与之所以精于董仲舒的学说，很有可能是出于应付考试的需要。况且清高宗在位期间不仅一次以董仲舒之言作为考试题目<sup>③</sup>，文臣士子有所准备也是理所应当。而且据《四库全

① 这个观点可以参看张舜徽《清儒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321页。张先生原文是：“从这一联语中，可以知其为学为人，有与众不同之处，显然是有志于绍承和张大西汉微言大义的学者。”另外部分学者也有与之相近的论述。

② 原文：“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日用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但是，这仅仅是严格依据文字来判断典出何处，忽视了对联用典的具体语境和文意。细按《汉书·艺文志》所称“古之学者”，必不是班固前后时代的学风。而且班固之前的汉代经师多是专家，能够淹通五经的似乎不多。若从《汉志》原文来看，三年通一经，通五经则须十五年，故而要是能够三十岁五经通达则须十五而学，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因此这可能是孔子教导学生之法，严格来说以此形容孔子或七十子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尚可，倘若凭此认定为汉代学风则略显不足。

③ 参看[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书春秋繁露目录后乙巳》，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6月，第113页。原文：“我皇上新考试词臣，取仲舒语‘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命题。”

书总目》等文献所载,全面反映董仲舒《春秋》学的著作《春秋繁露》是在修纂《四库全书》时据《永乐大典》辑佚补全的,之前三四百年虽有版本传世但并无全本<sup>①</sup>。那么还在乾隆初年时的庄存与又如何能够称得起精于董氏《春秋》呢?再考刘承宽论述刘逢禄的学术云:“大抵府君于《诗》、《书》大义及六书、小学,多出外家庄氏,《易》、《礼》多出于皋文张氏,至《春秋》则独扼遗经,自发神悟……”<sup>[15]</sup>如果庄存与所传和刘逢禄所学的都是公羊学,那么在刘承宽的话里不说其父的《春秋》学受之于庄存与,反而强调“独发神悟”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庄存与的《春秋正辞》虽然对清代公羊学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春秋正辞》中很多地方与《春秋胡氏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公羊学本来是纯粹的汉代学术,被视为清代公羊学开山之作的《春秋正辞》包容宋学的因素,既反映了庄存与今古博瞻、学兼汉宋的学术品格,也反映了清代学者对两宋学术理解与吸收,同时反映了清代儒家内部对义理的追求,以及科举考试对学术的某些影响。通过讨论,应该可以实证《春秋正辞》夹杂众多《春秋》学说,而非一部严格意义上谨守家法的纯粹公羊学著作。但是它对清代中后期公羊学真正复兴所起的启发作用仍然不能够忽视。

#### 参考文献:

- [1] 庄存与. 春秋正辞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2] 颜建华. 阮元《肇经室集》集外文辑佚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81.
- [3] 阮元. 肇经室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37.
- [4] 郜积意. 论庄存与的公羊学 [J]. 孔子研究, 2003 (5).
- [5] 黄开国. 《春秋正辞》的书法 [J].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302-303.
- [6] 胡安国. 春秋胡氏传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 [7] 孔颖达. 礼记正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609.
- [8] 赵沅. 春秋属辞·目录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64册.
- [9] 徐彦. 春秋公羊传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0] 范宁. 春秋穀梁传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1] 程颢. 二程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086.
-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4.
- [13]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23.
- [14] 汤志钧. 庄存与年谱 [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2000: 13.
- [15] 刘逢禄. 刘礼部集·卷十一附 [M] // 清代诗文集汇编·清刻本. 第五叶.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nqiu zhengci* by Zhuang Cunyu and *Chunqiu hushizhuan*

Qian Yin

**Abstract:** Scholars doing research on GongYang Study revival in the Qing Dynasty usually consider *Chunqiu zhengci* (A Correct Ver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Zhuang Cunyu as a significant work of GongYang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of its interpretation of annals and investigation of its citations, it is found out that Zhuang's book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unqiu*

① 永瑤《四库全书总目》卷三·提要原文:“……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鑰所校,乃为定本。鑰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为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



(收稿日期: 2016-07-13; 责任编辑: 沈秀)

# A Decoupling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essure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king reasonable energy-saving policies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apio elastic analysis method for decoupling indexes to refine the decoupling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essure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4 is studied. Us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integrate resource consumption indexes (energy, electricity and water) and pollution indexes (industrial wastewater, dust, sulfur dioxide and general industrial solid waste) and to measure comprehensiv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essure, the decoupling state of Jiangsu is deeply analyzed. It demonstrates that: Jiangsu shows a gradually decoupling tren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2000-2014, and there is a periodical phenomenon of TDI, that is, high in both ends and low in the middle in every five-year plan. Water consumption, wastewater and sulfur dioxide emission are well controlled and absolute decoupling has been achieved in most of the years. On the contrary, the situations of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industrial solid waste are not optimistic. In additi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dust have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their pressure on economic growth is eased gradually. Finally, targete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is provided.

(收稿日期: 2016-07-19; 责任编辑: 沈秀)